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陈 希¹, 李俏梅²

(1.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2. 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作者简介] 陈 希(1968-), 男, 湖北鄂州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李俏梅(1968-), 女, 湖南涟源人,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摘 要]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 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 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 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 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 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 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 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关键词] 中国新诗; 象征主义; 纯诗; 变异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42-05

“纯诗”是象征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1920年, 瓦雷里在为柳西恩·法布尔(Lucian Fabre)的诗集《女神底诞生》(Connaissance de la déesse)所写的前言中, 提出“纯诗”(La Poésie Pure)概念。此前, 马拉美论述“绝对的诗”与“人类语言”或“纯粹的语言”等问题时实际上也论及纯诗问题。瓦雷里的“纯诗”理论, 提出了一个诗歌本体论的命题: 诗的特质是什么? 他沿袭马拉美的思路, 认为诗歌之纯粹是自觉和特意地创造一种使语言像音乐那样自足存在, 绝对的澄明。瓦雷里向往音乐奇妙的力量, 认为音乐的纯粹性和感染力能使人达到艺术最高享受, 但诗歌在音乐面前“感觉着自己的孱弱和而衰颓了”, “诗人们底财富与衰产, 似乎未曾这样确切地感受威胁”。“纯诗”实际上追求把诗和其他非诗的东西分开, 消除一切遮蔽而孑然独立, “从音乐中重新获取诗人们本有的一切”。瓦雷里把“纯诗”的追求追溯到爱伦·坡和波德莱尔, 指出爱伦·坡开创了“象化学般的对于纯诗底制作”, 而波德莱尔是“第一个感受音乐底影响”的诗人^[1](第222-224页)。瓦雷里的《诗》^[1](第6-18页)论述诗歌以文字作为媒质创造艺术的复杂艰难和特别: 文字是一种粗糙杂乱的工具, 循习惯而演进, 依风俗为奴隶, 文字兼有意义和音乐性两种特质, 但皆迷离不定, 诗人不得不俯就这种普通流行的实用工具, 来作特殊的非实用的事业。而音乐家用音乐为创造艺术的工具, 是精美、澄明、纯粹的, 可以用物理学的原理分析声音, 研究音律, 音乐的创造和发展获得独立和开阔的空间。由此, 瓦雷里论述了诗歌和散文的分别。诗追求音乐样纯粹的语言, 散文则是追求语义的明白; 诗的对称垂摆回击在语义和音乐的出发点上, 而散文由语义趋向意旨。诗不像散文那样去描写或叙述种种事件以构造一种真实的幻象, 它直达我们身心全体, 以音节激动我们筋肉的组织, 舒放我们语言的本能, 唤起人生最高的一致与和谐。瓦雷里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就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而言, 诗歌与散文的区别好比跳舞和走路, 跳舞的意义在于动作本身, 而走路的目的在于行为所指向的目的地。1922年至1923年冬, 瓦雷里作了一系列演讲, 进一步修正和阐发“纯诗”理论, 后来还认为不提“纯诗”, 而用“绝对的诗”的说法也许更正确^[2](第67页)。

围绕着“纯诗”问题,当时还引起一场争论。白瑞蒙神父(Abbé Bremond)在法兰西学院作过“纯诗”的演讲,与瓦雷里高标“文字的音乐调子”的纯诗论不同,白瑞蒙神父强调诗的神秘本质,“纯诗”是借着文字的魔力给予或实施传达一种玄秘或半玄秘的境界^[1](第197页)。白瑞蒙也追求诗歌的音乐性,但认为诗是最隐秘的灵魂之吹奏者;诗歌是祈祷,是一种咒语和魔法。白瑞蒙著有《纯诗》和《祈祷与诗歌》两本论著,阐述他的纯诗论。持灵感说的象征派诗人克洛代尔致函白瑞蒙,赞同白氏的纯诗论的观点,认为白瑞蒙用“纯诗”解释了诗歌神灵感召的微妙意义^[2](第52-56页)。

瓦雷里和白瑞蒙的纯诗论实际强调的都是诗歌的自体自足和超然,只不过瓦雷里的音乐性追求和对诗与散文的区别侧重语言和诗艺本身探讨,而白瑞蒙的神秘本质论侧重的是审美方式和超验性诗学观问题。象征主义的纯诗论对西方现代诗歌观念的建立有很大影响。中国新诗引入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新诗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 and 演绎,其原因是瓦雷里纯诗论涉及的音乐性追求、审美价值关注和对散文化的警惕,这些都与中国新诗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紧密相关,引入纯诗论符合中国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诗学的自律,并且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追求蕴涵东方因子,能在中国传统诗学中找到某些依据。而白瑞蒙的神秘超验论在中国缺少接受的现实契机和相应的诗学传统,东方因子对主体的选择产生制约作用,甚至滋生“抵抗性”。

象征主义纯诗论有着独特而复杂的内涵,追求音乐样纯粹的语言是其要义。当时的中国论者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特别是关于音乐性的特殊而复杂含义有较深入的理解。吕天石认为,象征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神经刺激艺术和表达刹那间的情调,并不致力于反映对象的外形和内容的整合,因为象征主义的“象征”不像古时的象征,一定有形式和内容两个要素,象征主义的外形即是内容。从审美方式来看,象征诗和音乐是一致的。音乐直接刺激神经,音波的高低,马上就现出一种情调来。吕天石分析说,象征主义诗人认为情调是不可捉摸的,以言语传达出复杂微妙的情调是不可能的,非由音乐所给予神经的震动不可。也就是说,诗人直接用言语记录触动情调之音律。象征主义追求诗歌的音乐性,是追求诗歌言语像音乐那样直接感动人的功能,这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所以到了极端,就是词句全不成意义,只要音律能传达出情调,已经是诗”^[2](第155页)。吕天石进一步分析象征派诗歌关于音和色的追求,认为象征主义追求神经艺术,这个刺激愈强锐愈好,所以不得不注重色彩或音律的感觉。可惜,吕天石只是作纯客观的学理介绍——他是在一本欧洲文学史著作中作如是论述的,他的理论“洞见”没有立足中国新诗实践,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

而初期白话新诗诞生,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关注“纯诗”问题。“五四”诗歌革命倡导“诗体大解放”,一方面使诗歌突破旧诗藩篱获得新生;另一方面,“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在提供自由创作空间和可能的同时,遮蔽和忽略了新诗本体的意义和艺术品格,造成诗的驳杂不纯。1920年,李思纯针对早期新诗的平实、幼稚和粗糙,提出创造“深博美妙复杂的新诗”的诗美理想;田汉强调诗歌语言的音乐性追求,说诗歌和音乐“同属人类内部活动之音律的表出,而音乐以声音之暗示 suggest 而独立,诗歌以言语之表象 symbolize 而独立”。李、田当时都致力于象征主义的译介,所论受到象征主义的启发。1921年至1922年发生的关于诗是唯善唯真还是唯美的争论,孕育着纯诗的观念。俞平伯的《诗底进化的还原论》重诗之善的社会效用、诗之真的写实性,轻视诗的艺术性和个人性。康白情、杨振声、梁实秋等提出与俞平伯不同的看法。周作人的《诗的效用》对俞平伯“好诗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数人向善”的观念提出质疑,倡导“为诗而诗”的唯美诗学。周作人由“进化的人道主义”转为历史循环和人生虚无论者,文学上则从为人生的启蒙——写实主义转变为为艺术的唯美——象征主义。此期他倾心译介象征主义诗作,并积极支持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直接催生中国初期象征诗派。李思纯、田汉、周作人等的唯美诗学,是就初期白话新诗流弊作出的反思,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理论是他们借鉴参考的资源,但他们的论述只是蕴含和体现“纯诗”诗学思想,尚未明确提出具体的纯诗理论。

正式提出“纯诗”主张的是穗木王。穗木王留学日本,接受法国象征主义,不仅创作象征诗,而且潜

心研究象征主义诗学理论。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用法文写就的毕业论文《阿尔贝·莎曼的诗歌》，深入探讨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莎曼(Albert Samain)所受影响和创作个性。1926年，穆木天发表中国象征诗学重要文献《谭诗》，急切呼唤“纯粹的诗歌”：

我们要求的是纯粹的诗歌(The pure poetry)，我们要住的是诗的世界，我们要求诗与散文清楚的分界，我们要求纯粹的诗的Inspiration。

王独清也是纯诗论的积极倡导者，他的《再谭诗》认为：“要治中国现在文坛审美薄弱和创作粗糙的弊病，我觉得有倡的必要。”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诗理论，源自法国象征主义；文中直接引述许多象征主义诗人诗作和理论，“纯粹的诗歌”具体论及的诗歌音乐性追求，暗示性和朦胧性特征，色、音的契合或“交响”(Correspondance)，潜意识反映等，都是直接取自象征主义诗学。但穆木天、王独清等的纯诗论和象征主义的纯诗论还是有差异。

首先，二者虽然都强调诗的自足性和与散文的区别，但历史语境和意义指向不一。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的诗，主要的还是对胡适“作诗如作文”主张给新诗带来的“罪过”的反思和批判。穆木天认为，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的罪人，他的新诗理论是“给散文的思想穿上韵文的衣裳”，结果产出不伦不类的东西。因此，穆木天、王独清倡导纯诗论是“现实的需要”。而瓦雷里等象征主义的纯诗是从诗歌本体论角度，回答诗歌本质问题提出的。在象征主义者那里，纯诗是诗歌的“无能”写作产生的向往——诗歌无法像音乐那样纯粹、澄明。纯诗是一种理想，瓦雷里明确指出，“象完全的‘真空’与绝对的‘零’一样，那些理想是不能达到的，甚至于除了继续不断的努力以外，还不能接近的。”那么，提出纯诗的意义何在呢？瓦雷里说，“我们最终的纯粹的艺术，是要求着那些怀抱有这些理想的人们长期的与严肃的锻炼，以至于求作诗人的自然的欢欣完全吸收在工作里，只剩余着一种决不自满的骄傲。”^[1](第234页)所以，象征主义诗人提出“纯诗”，虽然也比较过诗歌和散文的区别，但并不是针对诗歌创作的倾向或弊端进行规范，而是立足诗歌本质和诗歌理想追求。

第二，他们都强调诗歌音乐性，但内涵有别。穆木天、王独清所谓的音乐性，主要是形式论。穆木天要求纯诗在形式上是“一个有统一性有持续性的时空间的律动”，认为“诗是数学的而又是音乐的东西”；王独清想学习法国象征派诗，“把‘色’(Couleur)与‘音’(Musique)放在文字中”，认为“音乐是最能起那种使人一瞥间忘却眼前现实的作用的，同时又最适宜于传达‘不明了’的或朦胧的心理状态，这便使象征主义底艺术获得了理想的成功”。象征主义的音乐既是形式命题，又更多的是本体论范畴。音乐是精美、澄明、纯粹的，瓦雷里向往音乐奇妙的力量，认为音乐的纯粹性和感染力能使人达到艺术最高享受，诗歌之纯粹是自觉和特意地创造一种使语言像音乐那样自足存在，绝对的澄明。纯诗论的音乐性追求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诗歌的语言的纯粹性追求，这不仅只是节奏、韵律等形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语言本体去掉粗糙、歧义，获得像音乐那样精致、“纯粹”。穆木天、王独清所论多将语言和音乐的关系分开，或者说没有体认到纯诗最终关系到语言的确定和澄明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象征主义的纯诗是通向超验天国的旋梯，充满神秘性，而穆木天等的纯诗虽然也提出诗反射“不可知的远的世界，深的大的最高生命”，认为“诗是内生命的象征”，但强调诗必须立足于“平常生活的深处”，这种关于诗歌的“内生命”的思考，仍是现象界的探询而不是超验界的追问。这也是民族审美传统使然。梁宗岱的纯诗论在融合民族审美传统点上更有代表性。

与穆木天等的纯诗论来自对新诗流弊反思不同，梁宗岱的纯诗论更多的是对新诗自身发展的总结。一些诗人接受象征主义，探索审美世界，吟咏艺术人生。诗歌回到自己的“老家”，纯粹的诗的创作实践，使得诗人和诗论家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同时，开始民族象征诗学的思考和建构。作为瓦雷里的好友和信徒，梁宗岱对“纯诗”了然于胸，体认纯诗理论“滥觞于法国底波特莱尔，奠基于一马拉美，到梵乐希而造极”。梁宗岱30年代初提出“纯诗”，源于对新月派以情感与想象为审美方式的诗学观的审视，他引用里尔克的话，认为诗歌“并不像大众所想象，徒是感情(这是我们很早就有了的)，而是经验”——经验

和体验的传达,是象征主义诗学的审美方式。梁宗岱的观点招致梁实秋的反,梁实秋指责这是“弄玄虚,捣鬼”。梁宗岱认为象征体验诗歌蕴含着“高深、精微”的精神活动,批评家不应该固步自封,成为“识盲”,“看不懂或领会不到的时候,只下一个简单严厉的判词:‘捣鬼!弄玄虚!’”。梁宗岱实际在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客观的现实主义和感伤的浪漫主义的现代象征诗学,而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是破除“旧的成见”之关键。梁宗岱对“纯诗”的理解和阐释深入而独到:

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式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那感官与想象的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象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配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

梁宗岱认识象征主义“纯诗”的音乐性的深刻而独特的含义,领悟到诗歌的纯粹性实质上是使语言像音乐那样自足存在,绝对的澄明:诗的“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梁宗岱将诗歌语言从形式媒介上升到诗歌本体的地位,这是一种“纯粹语言”。由于诗歌本质上是语言的艺术,这种纯粹语言观使象征诗学一下跃升到本体论范畴获得现代意义,这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突破性。

梁宗岱的纯诗论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这既是受瓦雷里诗学的影响,也更多的是源于中国新诗的现实契机。梁的纯诗论不仅强调诗歌摒除散文因素,使诗歌获得完全的自足和自律,而且结合中国新诗的发展,倡导中国现代象征诗学。这种现代象征诗学的建构,不是完全移植西方,而是将诗学触角深入中国古典诗词,自觉寻找民族传统诗学资源的支持。《谈诗》是反映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的重要文章,梁宗岱在文中指出:“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因为这是诗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到的,无论有意与无意);姜白石底词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个。”梁宗岱具体分析了姜白石《暗香》《疏影》两首诗,说这些纯诗“引我们进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度给我们一种无名的美底颤栗”。更妙的是,梁宗岱自觉将中西诗学进行比较,以联系的观点从中西诗学融合的角度阐发“纯诗”特征。他写道:

马拉美酷似我国底姜白石。他们底诗学,同是趋难就易(姜白石曾说,“难处见作者”,马拉美也有“不难的就等于零”一语);他们底诗艺,同是注重格调和音乐;他们底诗境,同是空明澄澈,令人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尤奇的,连他们癖爱的字眼如“清”“苦”“寒”“冷”等也相同。

梁宗岱学贯中西,领悟象征主义的精髓,又有深厚的中国古典诗学修养。他立足新诗实际,着眼新诗现代化发展,吸取西方象征主义的有益东西,主动采撷传统诗学营养,显示了民族现代象征诗学的自觉。穆木天的《谭诗》也有这种自觉,说李白的诗“到处是诗,是诗的世界,有一种纯粹诗歌的感”。尽管梁宗岱、穆木天的纯诗论缺少现时诗歌创作的参照而实践性不强,但这种诗学理论呼唤标志着新诗象征诗学建构已经开始并打造了高标准的平台。

而刘西渭、朱自清、施蛰存、陈梦家等关于“纯诗”的思考和建设,比梁宗岱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在20世纪20年代,刘西渭、朱自清就译介过A.C.布拉德雷的《为诗而诗》和R.D.詹姆斯的《纯粹的诗》,但他们的贡献主要在对30年代戴望舒、卞之琳、李广田等诗人诗歌创作的批评,从新诗实践层面而不是理论上建构了纯诗诗学,并对诗歌创作的纯诗化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刘西渭从“纯诗”立场对卞之琳的《鱼目集》和李广田的《画廊集》给予高度评价,肯定“寻找的是纯诗 Pure Poetry”;朱自清《抗战与诗》对抗战前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作了描述,认为“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老家”说明象征主义的纯粹诗学乃诗之本。而施蛰存在谈到《现代》诗风和特征时,宣称“《现代》中的诗是诗,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这是诗歌创作“前线”对“纯诗”的倡导和呼唤。在此之前,后期新月派也不约而同标举“纯诗”,1931年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明确表示:“我们喜欢‘醇正’与‘纯粹’。我们爱无瑕的白玉和不断锤炼的纯钢。白玉好比一首诗的本质,纯粹又美,钢代表做诗人百炼不锈

的精神”。兴许是受到梁宗岱的自觉建构民族象征诗学的感染,陈梦家在回首新月派新诗创作追求“纯粹”本质的同时,说“我们相信一点也不曾忘记中国三千年来精神文化的沿流(在东方一条最横蛮最美丽的长河),我们血液中依旧把持住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因为他们深刻体认:“到了这个世纪,不同国度的文化如风云会聚在互相接触中自自然然溶化了”。

至此,来自新诗批评实践的“纯诗”已经很少比照象征主义的原来意义,而是直接根据中国特有的新诗创作实践生成新的意义,强调诗歌艺术的独立自足,形式的完美精致,情感思想和审美体验的真切。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还泛化为价值论和形式论的意义。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成为中国新诗象征诗学的范畴,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参 考 文 献]

- [1] 曹葆华. 现代诗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 [2] 黄晋凯. 象征主义·意象派[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3] 吕天石. 欧洲近代文艺思潮[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1.
- [4] 李思纯. 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J]. 少年中国, 2(6).
- [5] 田 汉. 诗人与劳动问题[J]. 少年中国, 1(8).
- [6] 仲 密. 诗的效用[N]. 晨报副刊, 1922-02-26.
- [7] 陈 惺, 刘象愚. 穆木天文学评论选[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8] 穆木天. 谭诗[J]. 创造月刊, 1926(1).
- [9] 梁宗岱. 论诗——致徐志摩[J]. 诗刊, 1931(2).
- [10] 梁实秋. 什么是“诗人的生活”[J]. 新月, 3(11).
- [11] 梁宗岱. 谈诗[J]. 人间世, 1934(15).
- [12] 施蛰存. 又关于本刊的诗[J]. 现代, 1933, 4(11).

(责任编辑 何坤翁)

On Chinese New Poetry's Acceptance and Variance of Pure Poetry of Symbolism

CHEN Xi¹, LI Qiaomei²

(1.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ies: CHEN Xi(1968-), 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 Qiaomei(1968-), female,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ongs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Chinese new poetry's acceptance and variance of the pure poetry of symbolism. Chinese new poems receive the pure poetry of symbolism along Aesthetic experience more than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and choose mainly the pure poetry of Paul Verlaine, and show its variance and creation.

Key words: Chinese new poetry; pure poetry; acceptance and variance